

大陸教育研究中的「京派」與「海派」

鄭金洲

在大陸教育理論界，人們一般都忌談派別，時而也常有大陸教育研究無派別的慨嘆。如果從理論主張及思潮來看，或許的確是如此。但若從研究風格及特徵的角度來分析，卻不得不承認有「京派」與「海派」的大致分野。「京派」與「海派」的區分，雖未涇渭分明，大相徑庭，但的確體現出了有著些許差別的研究理路，成為大陸教育研究中的兩支各具特色的方面軍。本文所要探究的，就是分析「京派」與「海派」的特徵，並探其成因，察其得失，瞻其走向。

「京派」與「海派」的特徵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京派」與「海派」，雖然分別以京滬兩地為「主戰場」，但並非僅限於這兩地，也涉及大陸其它地區的一些研究者。換言之，「京派」與「海派」與其說是一個地域概念，倒不如說是一個類型概念。

關於「京派」與「海派」的相對區分，從目前所能及的研究材料上來看，似乎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見其端倪。

(一)在吸收國外教育理論研究成果上——「京派」雖不反對「洋為中用」，但引進介紹國外特別是歐美的教育理論相對較少。該派立足於大陸實際，重視對已有文化遺產、經驗的整理與彙綜。也就是說，重視「古為今用」，重視從昨天的歷史回溯中找到闡釋今天、通往明天的路徑，重視在教育實踐中挖掘富有生命力的「閃耀的火花」、與此同時，北京由於在歷史發展過程，曾是傳播、推廣前蘇聯教育思想和經驗的中心之一，深受前蘇聯教育觀念、理論的影響，因而「京派」在教育理論及對西方教育理論的評價上，多少留有一些前蘇聯的痕跡。相形之下，「海派」則不遺餘力地吸收介紹國外的教育理論成果，重視橫向上的引介、考察與比較。自1978年以後來，他們突破狹隘的國界限制，為國人捧出了西方乃至前蘇聯教育理論的簇簇花團。先後最先介紹了前蘇聯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贊科夫的教學與發展理論，巴班斯基的教學過程最優化理論以及「合作教育學」；前西德的範例教學和當今的批判教育學；北美國家布盧姆的教育目標分類學及掌握學習，布魯納的發現學習，奧蘇伯爾的接受學習理論等等。其中的一些理論（如布盧姆的目標教學）已在大陸生根發芽，廣泛推廣開來。

(二)在理論的闡釋與建構上——「京派」重視觀點的提出和理論的闡發，善於針對實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對理論進行較為完整的建構。他們從大處著眼，注重從宏

觀上、整體上把握教育問題，闡釋教育理論。而「海派」則有「於細微處探幽妙」的特點，重視分析基本概念、範疇間的區別與聯繫，注重對問題的追本溯源，力求做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帶有濃郁的「經學」味道。他們還倡導材料與觀點的統一，在理論的陳述上，強調觀點以材料為依據，不太主張有感而發。

(三)在教育理論研究與政治的關係上——「京派」由於地處京城，有天時地利之便，因而在大陸教育政策、法規的制定上，多有該派研究者參與貢獻智慧，協助決策部門調查研究，提供理論上的論證。一旦這些政策、法規頒行，又責無旁貸地對其進行詮釋、說明，為政策、法規等的貫徹實施再獻棉薄。在這一點上，「京派」體現出了較濃厚的現代意識與政治參與意識。「海派」雖也與政策、法規制訂有一定聯繫，但因地緣、文化等因素，這種參與多半是地方性的。他們更多體現出的是研究者本人的主體意識和自我意識，重視學術上的探討與爭鳴，以「只有一種觀點的學術是死亡了的學術，沒有爭鳴的學術是窒息了的學術」為思想指針，大力提倡學術自由。

(四)在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京派」注重從實際出發，強調理論，為實踐服務，理論上的研究課題盡量地力求實踐。受這種思想支配，他們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產生了一定回響。他們還著力編寫了各種類型的《教育學》教科書，做了許多普及性的工作。「海派」並不否認理論與實踐間的密切聯繫，但似乎更多地看到的是理論與實踐對立統一的一方面。其理論研究或者說思辨性研究居多，重視理論上的探討，邏輯上的分析，哲學上的思辨。如今其方興未艾的「多元教育學討論」也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此外，在行文風格上，「京派」以其樸素平直的文風見長，文字通俗明瞭，有有「唯實主義」之風；而「海派」則從形式上表現出濃濃的「書院」氣，行文考究，注釋規範，通篇理論色彩濃郁，頗有「唯美主義」之範。

以上特徵的區分，雖難免有失當之嫌，簡單之疑，但無論在兩派研究者團體身上，還是在某一學科上，或者更具體地述於各自出版的期刊雜誌上（如北京中央教科所的《教育研究》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科版）》），都多少有一定顯現。那麼，由此我們不得不問，這種研究特色是如何形成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深究其各自的文化與歷史根源了。

二、「京派」與「海派」的文化與歷史成因

大陸教育研究中「京派」的產生、發展，與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京派文化」或者說「皇城根文化」是緊密相聯的。它產生於京派文化，又發展於「京派」文化，同時又反過來豐富了「京派」文化。而「京派」又是源於敦厚保守為特徵的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原文化在「皇城根」的反映與顯現。因地處中原腹地，又是歷朝古都，京城經年作為政治和經濟的中心，逐漸地形成了文化中心的觀念和心態。這在明朝

時期表現尤為明顯，視別國為「蠻夷」，視鄰族為「戎狄」。就是在鴉片戰爭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時，也仍有「中國之雜藝不逮泰西，而道德、學問、制度文字莫然出於萬國之上，莫能及也」的怪論，把傳統的道德教化作為「天下之極致，性命之大原」。在本世紀前後，北京受洋務運動及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影響，也曾大力譯介西書，但隨後開展的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大大掩蓋了其聲勢。北京一時成了新舊文化交鋒、辯駁的主戰場。新思想、觀念迭出，新主張、黨派疊見，譯介西書雖未中止，但聲勢日微。1949年後，大陸不法歐美，效仿蘇聯，北京成了前蘇聯理論的集散地，教育也不例外。各地教育研究者雲集北京，聆聽蘇聯專家的報告，接受訓示，並進而在大陸各地推廣、普及。大概也正因如此，「京派」深受前蘇聯教育思想的熏染，至今仍可在其研究中窺見到這種影響。

北京凝聚了濃郁、深厚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在許多方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因為它地處天子腳下，所以歷來強調社會政治的和諧統一，注重培養人的群體意識、順情誠敬意識。在這種情形下，它的天時地利之便，就成了其言之虞——出言需慎，行為需檢，不主張人的獨立意志和銳意進取。如是，重守成而少創新，重馴從而少獨立，就構成了其文化特徵之一。他們關心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甚於關心文化，密切關注意識形態上的變化，教育研究上也時時反映出濃厚的政治色彩和頗為保守的傾向。

與京派文化相比，海派文化是背離傳統文化的一種新興文化，其發展不過百餘年的歷史。它是洋派（歐美）文化與吳越文化的結合體。上海深受歐風美雨洗禮，其跡象甚是明顯。不需仔細尋覓，映入眼簾的外灘城市建築就可體現出「萬國博覽會」的色彩，從文藝復興巴洛克風格、折中主義色彩的古典主義風格到現代主義風格色色俱全。外文書刊特別是歐美書刊在30年代就已琳琅滿目。在1933年上海僅英文書刊就有20種月刊、19種週刊和6種雜類刊物；西文報紙10餘種；西書舖、西書館也比比皆是，真是「洋洋大觀」。西方文化對海派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文化研究方式到上海人的心態結構和生活方式，也深深影響著教育研究的某些方面，如注重吸收歐美教育思想、理論等。

與此緊密相聯，海派文化的另一特徵就是以開放的胸襟兼容並蓄。上海原本是「五方雜處」，浙江人、廣東人、蘇南人、蘇北人、本地人組成五大來源，各種文化相混雜，構成了一種歐美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內部的「移民文化」。歐美文化與吳越文化相匯合而構成的這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發展過程中，漸漸疏離敦厚保守的中原文化，形成了中國文化獨特的全方位開放模式，為現代文明的引進，先期地掃出了地盤。

海派文化的中方是吳越文化，它也一脈承襲下來一些吳越文化的要素，注重散逸、精巧、雅緻即為其一。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文化分為兩類：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從事理論或純學術研究就是高雅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他們的這種研究追求的是精與雅，排斥的是粗與俗。

如果稍加檢視，不難看出，「京派」「海派」的種種研究特徵都有其文化和歷史上的背景，是「鑲嵌」在其文化特色和歷史長河中的。拋卻文化，隔斷歷史，就無法

正確認識這兩個派別。

三、「京派」與「海派」的「得」與「失」

「京派」與「海派」以其不同的研究風格立於大陸教育研究之林，它們所發出的璀璨奪目的光彩，引起了海內外同仁的注意，大大推進了大陸教育科學的發展。依循其特有的研究取向，兩者各自發揮的作用不同，負面影響也因而各異。

「京派」注重對我國既有歷史遺產和經驗的分析，他們鑒往知來，無疑有助於探求教育運行的歷史軌跡，揭示教育發展的規律。因為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教育現象和問題，就不能忘記基本的聯繫，就要考察這些現象和問題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由此來把握其現狀。而對實踐中產生的教育經驗予以總結，把原來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論，概括成規律性的結論，可使得理論本身有較強的實踐作用，更好地指導教育工作。

「京派」把理論的應用價值放在重要地位。他們把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繫起來，強調理論與實踐，應用與實踐。這種對實踐的充分關注，使得教育理論呈現出勃勃生機和活力。

另一方面，「海派」就國外理論研究成果所作的大量的引進、介紹，既開闊了大陸教育研究者的視野，也有助於深化教育科學研究。在國際交流日益擴大的今天，教育研究已經跨越了國界，歐美等國的一些研究成果雖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限制，但也不乏國際性的成分，有一些普遍的法則、事實、原理。放眼世界，研究世界教育理論的現狀與未來，是把握時代脈搏必不可少的環節。「海派」為大陸教育界洞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戶，它使得大陸由文化專制轉向橫看百川，兼采眾長，吐故納新。

「海派」還注重理論的認識價值，重視理論本身的建構，他們緊緊把握住理論思維中的邏輯、概念、範疇三個基本因素。在教育研究中，注意運用慎密邏輯思維的路線、途徑與方法。他們對教育理論中的概念、範疇進行仔細梳理，力求在可能的情況下明確概念、範疇的基本含義，明確概念與概念、範疇與範疇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反對運用語焉不詳、語義不明、交代不清的概念，提倡「清思」。在此基礎上，他們遵循邏輯法則對教育理論與實際問題進行分析，往往通過理論本身的內在一致性的聯繫，依據理論的抽象的層次性轉化、遞變，來闡明自己的觀點。這種理論研究，大大地深化了對教育問題的認識，有助於形成對教育本質與規律的全面掌握。

而凡事總是利弊兼具、得失共存的。「京派」與「海派」在各有其優勢的同時，實際上也就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凸顯了其不足。「京派」因其強調理論的應用性，強調已有知識、經驗的總結概括，使得其研究多經驗之談，少理論闡釋，有經驗主義之嫌；多政治影響，少學術探討，有政策詮釋之嫌；多本土觀念，少世界意識，有思想觀念專斷、視野狹隘之嫌。「海派」因其強調理論的認識作用，強調國外研究成果的吸收，使得其研究多書齋式學術思辨，少應用研究，有與實際聯繫不密切之嫌；多基本概念、原理的推敲斟酌，少理論的整體建構，有「繁瑣主義」「經院哲學」之嫌；多

國外材料移譯，少本土化的推廣應用，有「述而不作」之嫌。一正一反，兩相映證。

四、「京派」與「海派」能融合嗎？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考察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京派」與「海派」要不要融合？

如果從理論本身的建構來看，不同學派的存在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應是大力提倡的。大陸教育研究不僅需要「京派」「海派」也需要更多的派別產生。不同的派則以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研究特徵形成自己的「學派文化」，相斥相補，共生共存，結伴而行，可以推進教育科學研究。「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不同的角度而不是從一個角度去考察、研究教育現象與問題，會以動態的互補的方式將教育的「真面目」盡收眼底。而且，在學術昌明的今天，學派的繁榮與發展已有了適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處理學派、學說的方式，在大陸已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非與非、真理與謬誤、非此即彼的二元標準去截然分開。如此，不僅在內在要求上，而且在外部條件上，「京派」與「海派」都有可能繼續固著於自己的立場。

此外，「京派」與「海派」的分離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說明。其一，「京派」與「海派」的存在已歷經數年，它們是與其賴以產生與發展的文化緊緊地依附在一起的。只要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存在，大陸教育研究上的「京派」與「海派」的區分就會存在，只不過區分的界限會隨文化的更迭、時代的變遷而變得或明或暗而已。其二，「京派」與「海派」的形成還歸因於各自的研究風格、特徵的上下代之間的傳承，老一代研究者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著後來者，同化著他們的研究意識、態度及取向。大陸現有的研究體制和教學方式又使得各研究者團體傾向於成為一種相對封閉的體系，這種體系對其它研究風格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我們在看到「京派」與「海派」相分離的同時，也需考慮到兩者相互交融的可能性。特別是從教育研究未來發展的走向上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是存在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兩派會自覺不自覺地拆除置於中間的藩籬，拋卻其森嚴的壁壘，以和解的姿態邁出交融的步伐。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逐漸滲透到大陸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教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市場規律的調節與控制，為市場經濟服務。受其影響，政府決策部門等機構會越來越支持與市場經濟有關的、有一定社會經濟效益的研究項目，並從經費上予以保證。這會使得「海派」放棄自己的一部分研究領地和立場，轉而探討一些實際問題，注意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由於強調經濟資源的世界一體化，也從客觀上對大陸教育與國際接軌提出了一定要求。在這種情形下，「京派」的世界意識會越來越強，對世界範圍內理論研究成果的吸收也會越來越多，文化守成的觀念會由此從根本上發生轉變。另外，「京派」與「海派」的合作已漸漸增多，兩派共同承擔了一些重大研究課題，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交融也就有了一定的現實性。

編者按：本文作者鄭金洲先生，係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